

二 初窺巴黎的敦煌石室佚書

上一講說的是倫敦，這一講帶大家去巴黎轉轉。倫敦回來之後，我開始了歐洲大陸之行。歐洲大陸尋找敦煌的旅行，第一站當然去巴黎。

何謂「敦煌石室佚書」

我用「初窺巴黎的敦煌石室佚書」這樣的名字，是有緣故的，這是襲用自羅振玉最早刊佈伯希和敦煌所獲文獻的兩本書的名字：《敦煌石室遺書》和《鳴沙石室佚書》。

法國的敦煌收藏是伯希和探險隊的收集品。在當時的西方列強裏，法國的動作比較晚，勢力比較小。當時有一個中亞與遠東歷史、考古、語言、民俗考察國際協會，總部在聖彼得堡，由沙皇俄國控制，各國有分會，實際各自為政。新疆塔里木盆地南邊是英國人的勢力，北面是沙皇俄國的勢力，法國人沒有插足之地。法國人發現各國紛紛派出探險隊之後，也派了一支探險隊，伯希和當隊長，一個攝影師，一個測量員，共三個人。當時的探險隊人都很少，斯坦因探險隊也就三個人，斯坦因為主，兩個測繪員是印度考古測繪局的，純粹是幫手，用當時歐洲先進的測繪技術來測量地圖。斯坦因搭建的每個帳篷在他的地圖上都有經緯度座標，現在用 Google 可以找到斯坦因原來帳篷所在的地方。

1907年，伯希和探險隊三人從歐亞大陸坐火車到奧石，翻過帕米爾高原，到喀什噶爾，俄國駐喀什噶爾的總領事館接待他們。伯希和走的是絲綢之路北道，他先調查了喀什三仙洞，懸崖上的三個石窟。伯希和用蘆葦的方法從山頂蘆進洞裏，

裏面是空的，沒有什麼收穫。他就去了巴楚，發掘了圖木舒克地區的脫古孜薩來佛寺。這個寺漢語叫九間房，是一個九間大房子的佛寺，挖開之後都是佛像。這些脫古孜薩來寺的雕像非常漂亮，伯希和當時沒有都取走，取不走的回填到原地。伯希和當時站在小山包上拍了照片，我去過這地方兩三次，地形和照片上沒有變化，佛寺中大的房子還有兩三米高。二十世紀 50 年代中國考古工作者挖過一次，後來沒有再挖過。伯希和在脫古孜薩來佛寺發掘的菩薩非常漂亮，有一年有人在法國拍圓明園獸首，要上千萬。我在香港《明報》上發表了一篇小文章，說不如去法國弄回一個佛像。伯希和自己記載得清清楚楚，他沒花一分錢拿走了，我們打官司要容易一些。

伯希和的第二站是庫車，他看了克孜爾千佛洞和庫木吐喇石窟，覺得德國探險隊已經做了，就選擇了渭干河西岸的一個大佛寺遺址，叫都勒都爾·阿護爾（Douldour-aqour），這是當時的老鄉給伯希和念的名字。二十世紀 80 年代我們在新疆問老鄉這個名字，沒有人知道，因為現在叫夏克吐爾了，河對岸叫阿克吐爾。吐爾是指烽火台那樣的土包，吐爾底下肯定有遺跡。伯希和認為都勒都爾·阿護爾是《大唐西域記》記載的阿奢理貳伽藍，龜茲第二大佛廟。這裏出土了很多佛教造像，一批梵文佛典、吐火羅文 B（即龜茲文）寺院帳目文書、二百餘件漢文佛典和文書殘片。這二百多件漢文也是我去巴黎要看的物件，它們比較碎、比較小，跟敦煌的沒法比。

再下一步，伯希和到了烏魯木齊休整，遇到了清朝官員載瀾。伯希和與載瀾之前在北京相識，義和團運動時，正在法國使館的伯希和曾與義和團廝殺，並和載瀾談判過。兩人在烏魯木齊重遇，原來的仇人變成了朋友。伯希和休整後原本打算去吐魯番，吐魯番雖然挖的人多，但遺址也多，只要往下挖就有東西。吐魯番降水少，所有的東西都保存在地下。伯希和在載瀾手裏看到一卷敦煌寫經，判斷這是八世紀的古代抄本，於是放棄吐魯番，直奔敦煌。

莫高窟的洞窟大概有三層，當時有木製棧道，很多地方不好上去，很危險，我

們現在還能看到一張 1908 年伯希和剛到莫高窟時在木製棧道上的照片（圖 2-1）。現在我們看到鋼筋水泥的棧道是 1962 年加固的。伯希和在敦煌待了一個月，把藏經洞中數萬卷文書、絹紙繪畫全部翻一遍，工作量驚人。他還給莫高窟編了號，帶着攝影師拍攝了大量的壁畫和塑像照片，抄錄了洞窟中的題記。他繪製了莫高窟的洞窟分佈圖，每個窟用科學方法編號。1920-1924 年，他出版了六大本敦煌壁畫的圖錄，比其他國家都早。過去研究敦煌畫，比如松本榮一寫《敦煌畫研究》，他不是到敦煌看畫，他主要用伯希和的照片和伯希和、斯坦因拿的絹畫，把敦煌畫的整體結構給構建出來的。現在敦煌研究院學者的主要工作是把經變畫做細了，其基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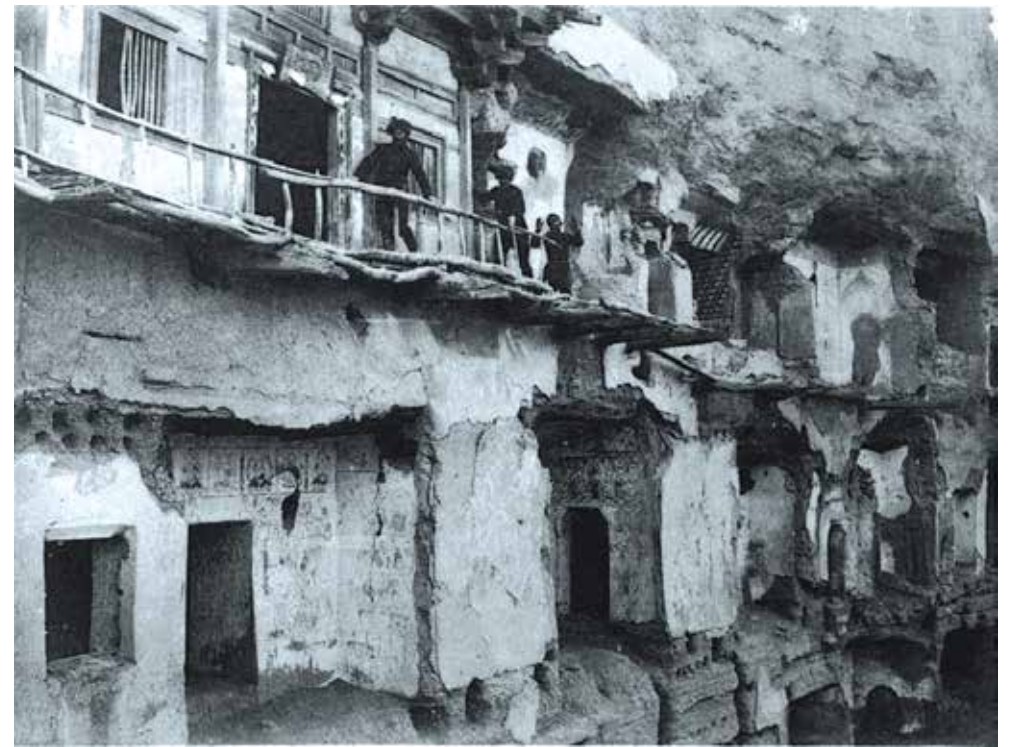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-1 伯希和在莫高窟木製棧道上

還是伯希和做的。伯希和對每個洞窟都做了詳細的快速的記錄，詳細到一個連環的經變畫，第一幅在哪，第二幅在哪，它上頭有數字。伯希和筆記現在已經出版，也有中譯本，但沒附原稿本圖片。伯希和的語言能力非常強，他一路走一路學，經過波斯學波斯文，經過塔里木盆地學維吾爾文，這筆記上有回鶻文，還有藏文，都是他摹寫的。伯希和是一個天才，在很長時間裏被西方推為「漢學之父」。

伯希和在敦煌最關鍵的工作是挑文書。伯希和會漢語，幾下就說服王道士，讓他進藏經洞自己挑東西了。之前斯坦因告誡王道士，不許把他來藏經洞的事說出去，王道士沒告訴伯希和。伯希和不知道斯坦因來過，他還說洞裏有點亂，以為東西是僧人逃跑時廢棄扔在這兒了，實際上一年前斯坦因把這翻了一遍。伯希和是第二個進藏經洞的學人，他選文書有三條原則，第一是佛教大藏經未收的佛教文獻，藏外的佛典，但他不是完全清楚哪些佛典是藏內，哪些是藏外的，很後悔沒有帶一本《開元釋教錄》；第二是選帶年款的，要有年代；第三選非漢語的。因此他所得敦煌寫本學術價值較高。後來北京官員拿了藏經洞文書，現在國家圖書館的收藏中于闐文只有一紙七行，粟特文一件都沒有，就知道伯希和挑選文書有多麼厲害。他最後悔的是沒拿走摩尼教殘經，這件沒頭沒尾看上去像佛經，其實是一個上千年的摩尼教的根本經典。

伯希和留下了一張他在藏經洞裏挑選文書的照片（圖 2-2），可以看到那些他沒有翻的，還是一個包一個包的經帙。伯希和收集品在學術界被評價得非常高，但是我做藏經洞整體構成的研究，覺得他把這一個佛藏給毀掉了，因為他要抽選，就把結構打散了。而且按照歐洲的收藏制度，經帙是美術品，放在博物館裏；裏面包的經是文獻，放在圖書館裏，原來一起的東西放到了兩個地方，沒法回去了。法國有個著名的研究遠亞的雜誌出過一個「紀念藏經洞發現 100 周年」的紀念專號，收了我一篇文章〈敦煌藏經洞的封閉及其原因〉英譯本。我在文章裏說伯希和把這個佛藏給毀了，法國人編輯的時候很不喜歡這話，就說伯希和沒有帶《開元釋教錄》，當時不知道這是一個藏。法國人很維護他們的學術領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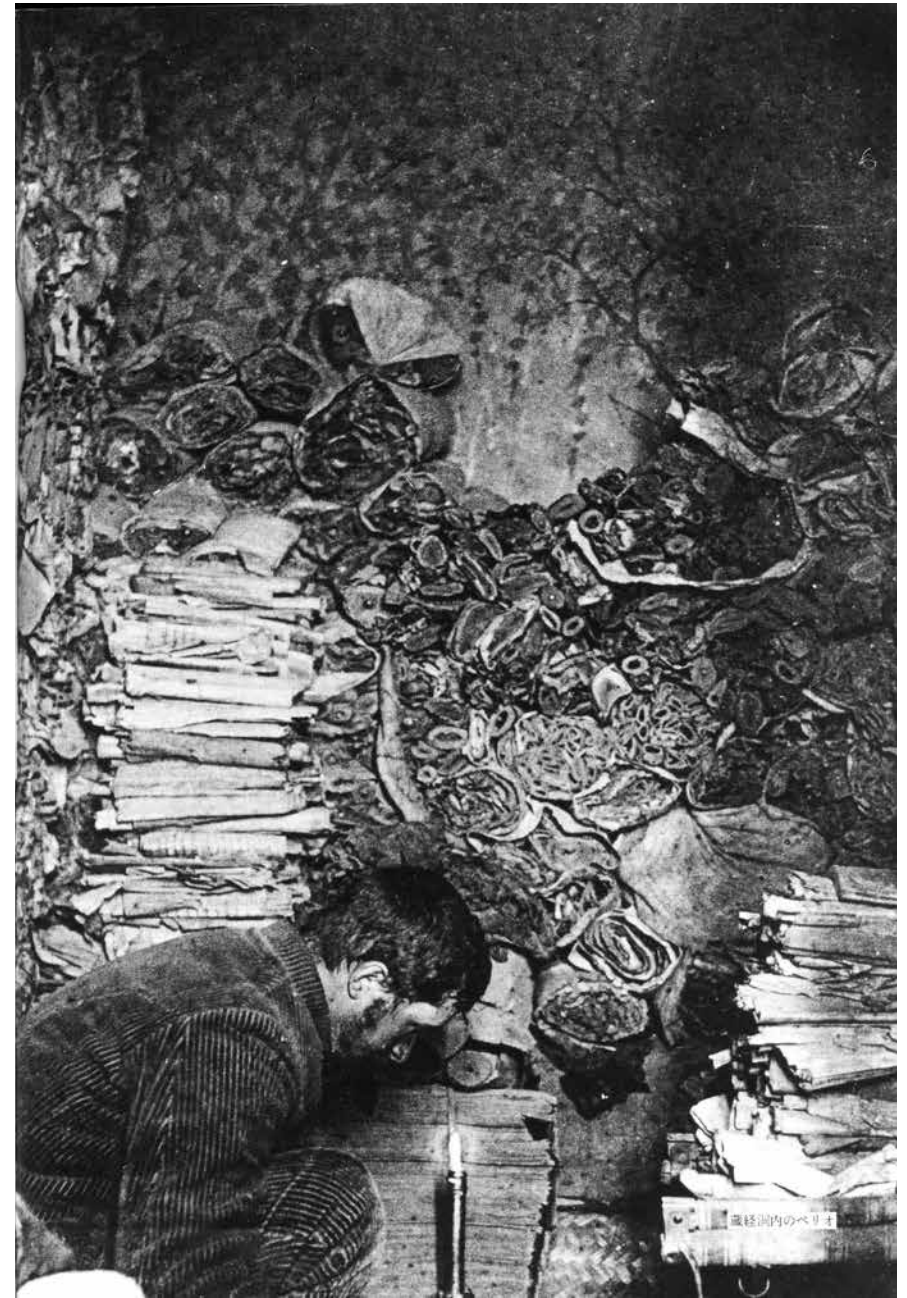


圖 2-2 伯希和在藏經洞裏挑選文書

我們來介紹幾件伯希和拿走的東西。

第一號叫《南海寄歸內法傳》，是完整的一卷，這是唐朝人或者五代人抄的，比現在所有刻本都早的本子。《大唐西域記》，伯希和拿了兩三件。這是早期的抄本，離成書不是特別遠，非常有校勘價值。

《文選》在唐朝是很重要的書，科舉考試要用。當時科舉考試的學生在寺廟裏複習功課，比如一件在長安弘濟寺寫的《文選》，而且《文選》後邊還有一句藏文，藏文是什麼字？就是「文選」這兩個字的拼音。這個卷子漢人讀，到吐蕃統治敦煌時期，藏人也在讀。這樣的文書是一個活的文物，表明不斷有人讀。現在有了新的書籍史的概念，敦煌文獻被重新賦予了書籍史價值，這就是一件，它抄得不是很整齊，這不是正規圖書館的藏書，一般就是僧人或者學子用的書。



圖 2-3 《鳴沙石室佚書》

《珠英學士集》是武則天周圍的珠英學士唱和詩歌作品的集子。文獻裏有記載這些珠英學士，但是這部的詩集早就丟了，伯希和在敦煌拿到了《珠英學士集》。吳其昱先生經過仔細研究，發現這是非常重要的資料。如果研究唐朝前期的宮廷文人集團，《珠英學士集》和《景龍文館記》這類文人集團的文獻是最重要的資料。如果沒有《珠英學士集》，我們就沒法具體分析都有哪些詩。敦煌《珠英學士集》有兩個抄本，一個伯希和拿走了，一個斯坦因拿走了。此外還有白居易的詩集，後來證明這個卷子不全是白居易的詩集，後邊還有李季蘭的詩。

《書儀鏡》是寫信範本，有吉儀和凶儀兩部分，比如有《父母亡告兄姐書》，一個弟弟在家，父母如果去世了，他怎麼給哥哥姐姐寫信。《父母亡告弟妹書》，如果哥哥在家，給弟弟妹妹怎麼寫信。跟現在的《出國大全》一樣，怎麼給外國導師寫

南陽張延綬別傳
浙西節度使權書
張延綬字楮紳即河西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
檢校尚書左僕射河西萬戶侯南陽張
字祿伯之第三子也博學多聞尤好評
禮蘊蓄百家之書靡不精矚留心
騎射頗得由基之術身長六尺有

圖 2-4a 《張延綬別傳》羅氏摹本



圖 2-4b P.2568 《張延綬別傳》原卷 (IDP 圖)

信，就是這類作用。官僚文人看不起這種書，他們大筆一揮就是一篇文章，這些書是給下層民眾準備的，所以在中原大多沒有傳下來，但是在敦煌保留着。伯希和很有眼力，他就拿這些東西。

伯希和也拿了一些畫，絹紙繪畫。有一幅畫得非常好的變文紙本畫，它的一面寫着敦煌變文的唱詞，一面畫了降魔變的六個故事，即舍利弗和勞度叉鬥法的六個場面，敦煌有好多這種勞度叉鬥聖變。這種畫是僧人講故事用的，有畫的一面對着觀眾，反面寫着詞。僧人講故事的時候怕忘詞，詞寫在反面，他講的時候可以偷偷看詞。我們現在看到刻本印的，圖就是圖，文就是文，其實兩面的文和圖是對應的。這種東西如果不是親眼實見，哪有這麼生動。

還有大量的非佛教、非漢語的文獻，比如一個藏漢對照的詞彙表。僧人翻經的時候遇到難解詞，他就做成對照表，跟我們現在的對譯表一樣。還有回鶻文的祈願文、朱墨兼寫的回鶻文的摩尼教文書。有于闐文的支出賬，寫得有點草，是個帳目。還有寫得非常規範的粟特文的禪宗典籍。粟特人原是瑣羅亞斯德教徒，後來皈依了漢地的佛教，不僅把《金剛經》、《維摩經》這種普通佛經翻譯成粟特語，也把漢地流行的禪宗典籍翻譯出來。這是很難得的胡語禪宗史料，但是比較難比定，至今沒有學者比定到底是禪宗的哪部經，當然禪宗的經典很多失傳了。此外，值得關注的還有突厥化的粟特語的帳目，是毛織物入破曆，這種帳記得比較草、比較亂。

1908年伯希和探險隊把敦煌西域的收藏品送出中國後，他本人先去越南河內的法國遠東學院述職，然後1909年又奉命往北京，代法國國家圖書館購買線裝古籍。他揀選了一些他認為最有價值的敦煌文獻和文書帶在身邊進行研究，不成想在北京走漏消息，羅振玉等中國士大夫紛紛來找他，要求抄錄這些敦煌資料。伯希和傾其所攜，供他們抄錄，於是羅振玉很快編成《敦煌石室遺書》，發表抄錄的經史子集四部書的成果，其中還收入蔣斧的《沙州文錄》、曹元忠的《沙州石室文字記》，主要抄錄非典籍類文書。以後伯希和為感激中國學者「以德報怨」，陸續又

把一些敦煌寫本照片寄給羅振玉。羅氏從1913年伯希和寄來的照片裏選了23件，編成《鳴沙石室佚書》（圖2-3），將這些寫本影印出來，其中包括《隸古定尚書》、《春秋穀梁傳解釋》、《論語鄭注》、《春秋後語》、《晉紀》、《闕外春秋》、《水部式》、《諸道山河地名要略》、《貞元十道錄》、《沙州圖經》、《西州圖經》、《太公家教》、《星占》、《陰陽書》、《修文殿御覽》、《兔園策府》、《唐人選唐詩》等四部要籍，都是清朝士大夫感興趣的。當時是辛亥革命後，羅振玉跑到日本，這本書就是他在京都的書庫宸翰樓影印的，只印了一百部送給朋友。這一百部很快就沒了，後來不斷有人找他要這書，於是1928年他讓兒子摹抄一遍，以應所求。

這個摹本每篇文書的字基本上跟原卷的字一樣，但是有漏抄，我在開始做敦煌研究的時候，就被帶到溝裏了。這本書裏有一篇《張延綬別傳》（現在編號P.2568），傳主是歸義軍節度使張淮深的兒子。作者題名處，摹本只有「張」字（圖2-4a），我以為這是原卷模樣，所以在習作〈敦煌卷子割記四則〉中¹，把摹本當作原本，沒有重視看過原件的王重民先生所說此卷「亦為〔張〕球所撰」的提示，以為「從原卷照片卻找不到『球』或『俅』字的痕跡」。事實上，原件上清清楚楚有「俅」字（圖2-4b），可能是這裏有油污，字又小，羅氏摹本乾脆給省略掉了。我的文章發表後，左景權先生給我寫信，說你弄錯了，原件上清清楚楚有作者名字，你看的是個摹抄本。這下我才明白過來。我舉這個例子是想告訴大家，我過去掉進過這樣的陷阱，所以我一定要到巴黎，把這些看不清楚的文字落到實處。

1 載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論集》第2輯，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83年，頁631-673。